

谈文惑正

蒋子龙著

不惑文谈

蒋子龙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99671

责任编辑：赵南荣

封面设计：朱展程

不感文谈

蒋子龙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88,000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500册

书号：10078·3552 定价·1.30元

序

夏康达

子龙：

不知何故，今晨醒得很早，在迷迷糊糊之中，忽然给你谈创作的集子想到了一个题目。事后我自己也莫名其妙——怎么想到这件事上去的？怎么会蹦出这么个题目？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当时确乎处于一种朦胧状态。这可真是“意识流”了。

题目叫《不惑文谈》。不惑者，出自孔圣人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你的创作谈多数发于四十岁前后，正当不惑之年。当然“不惑”二字别有深意，在当前多种文艺思想都很活跃的情况下，不受迷惑，认准自己的道路坚持走下去（不等于别的文艺思想都要加以否定，但每人应选定最适合自己的道路）；此外，在成名之时，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不受各种诱惑之意。真正做到“不惑”是很难的。但我想经历了这么多曲折磨难，我们在跨进四十岁时，基本上可以说是“不惑”了吧！另一方面，也可以“不惑”自勉。

不过，这个题目似乎书卷气太重了点，不知是不是适合你的风格。我想最好的鉴定方法就是你自己的感觉。如果

感到好，那就是合适的。如果你感到有点别扭，就是与你的气质不合。那末，即使这个题目再好，也要毫不可惜地抛弃它。

这半个月，始终没有想到什么稍有特色的题目，反而是在今天半睡眠的状态中得到了这么一个。虽说也不一定好，但至少具有了可以作为一个建议提出来的资格。

这几天杂事太多，得过几天才有时间去看你。故先写此信——估计你该从北京回来了。

匆此

好！

三月二十九日

D48.3/53

目 录

序.....夏康达 1

路,弯弯曲曲.....1

失败——作家最忠实的保姆9

道是无情却有情.....17

回 顾.....30

要不断地超过自己.....36

希望少一点遗憾.....46

《拜年》小序.....48

《乔厂长上任记》的生活帐.....51

关于《乔厂长上任记》的通讯.....61

生活和理想.....65

写给厂长同志们.....71

为“创业者”讴歌.....74

致《读书》编辑部.....78

——兼答鲁和光同志

关于“日记”的断想.....83

谁的心里不鸣奏着生活的交响曲.....88

“雷达站”及其它	96
跟上生活前进的脚步	103
——创作笔记	
作品的形式和生活的节奏	119
加速文学脉搏的跳动	124
小说杂谈	127
杂记三篇	145
时代召唤文学	156
人物·情绪·语言	168
大地和天空	174
表现新人切忌假大空	179
思想就是力量	185
领奖词(两篇)	188
谈“人”	190
小说的灵魂在哪里?	200
——在福建省小说创作讲习班上的发言	
从“劝业场”的酱牛肉说起	215
——作家思想和艺术修养漫谈	
范旭东和《资本论》	219
——记一篇作品的诞生之前	
文学——是电影的血液	222
电影改编之我见	226
庐山的冲击波	232
生活的诗	234

致蒋和森的信	238
从兵团到文坛	243
后记	252

路，弯弯曲曲

路——总是又远又长，命运和文学结合在一起，路就愈加离奇和曲折。这第一步是怎么开始的呢？是因为幸运，还是由于灾难？是出于必然，还是纯属偶然？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我有许多说不清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为什么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也许这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了？当时我可实在没有意识到。

豆店村距离沧州城只不过二十五里路，在我幼年的心里那好象是二万五千里，只有具备孙悟空的本领才能进得城去。我的“星期天”和“节日”就是跟着大人到十里八里外去赶一次集，那就如同进一次沧州城。据说城里是天天赶集的。我看的最早和最多的“文艺节目”，就是听村里那些“能人”讲神鬼妖怪的故事，讲的活灵活现，阴森可怖，仿佛鬼怪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晚上听完故事，连撒尿都不敢出门。那些有一肚子故事的“能人”，格外受到人们的尊敬，到哪家去串门都不会没有人敬烟敬茶。记得有一次为了看看火车是什么样子，我跑了十二里路来到铁道边，看着这比故事中能盘山绕岭的巨蟒更为神奇的铁蟒，在眼前隆隆驰过，真是大开眼界，在铁道边上流连忘返。以后又听说

夜里看火车更为壮观，火车头前面的探照灯比妖精的眼睛还要亮。于是在一天晚上我又跑到了铁道边，当好奇心得到了满足，美美地饱了眼福之后想起要回家了，心里才觉得一阵阵发毛，身上的每一个汗毛孔都炸开来，身后似有魔鬼在追赶，且又不敢回头瞧一瞧。道路两旁的庄稼地里发出“沙沙”的响声，更不知是鬼是仙。当走到村西那一大片松树林子跟前，就更觉毛骨悚然，我的村上种种关于神狐鬼怪的传说都是在那个松树林子里进行的，树林中间有一片可怕的、大小不等的坟地。我的每根头发每根汗毛都立起来了，脑盖似乎都要掀开了，低下头，抱住脑袋，一路跌跌撞撞冲出松树林。回到家里浑身透湿，象刚洗完了澡。待恢复了胆气之后，却又觉得惊险而又新奇。第二天和小伙伴打赌，为了赢得一只“虎皮鸟”，半夜我把他们家的一根筷子插到松树林中最大的一个坟头上。长到十来岁，又迷上了戏——大戏(京剧)和家乡戏(河北梆子)，每到过年和三月庙会就跟着剧团后边转，很多戏词儿都能背下来。今天《三气周瑜》里的周瑜吐血时，把早就含在嘴里的红纸团吐了五尺远，明天吐了一丈远，我都能看得出来，演员的一招一式都记得烂熟，百看不厌。

这也许就是 I 从小受到的文学熏陶。

上到小学四年级，我居然顶替“能能人”，成了“念故事的人”。每到晚上，二婶家三间大北房里，炕上炕下全挤满了热心的听众，一盏油灯放在窗台上，我不习惯坐着，就趴在炕上大声念起来。因为我能“识文断字”，是主角儿，姿势不管多么不雅，乡亲们也都可以原谅。《三国》、《水浒》、《七侠五义》、《三侠剑》、《大八义》、《济公传》等等，无论谁找到

一本什么书，都贡献到这个书场上来。有时读完了《三侠剑》第十七，找不到十八，却找来了一本二十三，那就读二十三，从十九到二十二就跳过去了。读着读着出现了不认识的生字，我刚一打怔神儿，听众们就着急了：“意思懂了，隔过去，快往下念。”直到我的眼皮实在睁不开，舌头打不过弯来了，二婶赏给的那一碗红枣茶也喝光了，才能散场。由于我这种特殊的身分，各家的“闲书”都往我手里送，我也可以先睹为快。书的确看了不少，而且看书成瘾，放羊让羊吃了庄稼，下洼割草一直挨到快吃饭的时候，万不得已胡乱割上几把，蓬蓬松松支在筐底上回家向大人交差。

这算不算接触了文学呢？那些“闲书”中的故事和人物的确使我入迷，但是对我学习语文似乎并无帮助，我更喜欢做“鸡兔同笼”的算术题，考算术想拿一百分很容易，语文——尤其是作文的成绩总是平平。

上中学的时候我来到了天津市，这是一个陌生的、并不为我所喜欢的世界，尽管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决不会低于前三名，仍然为天津市的一些学生瞧不起，他们嘲笑我的衣服，嘲笑我说话时的土腔土调，好象由我当班主席是他们的耻辱。我在前面喊口令，他们在下面起哄。我受过各样的侮辱，后来实在忍无可忍，拚死命打过架，胸中的恶气总算吐出来了，但是把“班委”的职务也打飞了。我似乎朦朦胧胧认识到人生的复杂，要想站得直，喘气顺畅，就得争，就得斗，除暴才能安良。一九五八年初学校开展“整团运动”，两个和我无冤无仇的好学生又“咬”了我一口，使我成了全校团员重点帮助的对象。我的错误之一：几个月前有一个被我们这些学生认为很有学问的教导主任戴上了“右派”的帽

子，她有一条“罪行”就是向学生灌输名利思想，宣扬一本书主义，我私下曾对那两个好学生说：“中国的作家那么多，每人要都写一本象《水浒》、《三国》、《红楼梦》那样的书也不错，中国就有很多好书可看了。”中毒极深，印证了那个倒霉的教导主任毒害青年学生的罪行之大。我的错误之二：不服从分配（保送我上师范学校不去），成天看小说，而且不加选择，什么《家》、《春》、《秋》、《红与黑》、《复活》全看。那两个好学生以前查过我的借书证，而且问过我有什么感想，我毫不警觉，大概还胡说八道一通，我说过就忘了，人家可都经过集中概括记在了小本子上。把这两条加以演绎，我的错误简单概括为，“受名利思想影响很深，想当作家。”根据“想当作家”这一条再加以演绎，在会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批判词，“……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的模样，还想当作家！我们班四十个同学如果将来都成为作家，他当然也就是作家了；如果只能出三十九个作家，也不会有他的份！”

批判可以忍受，侮辱和嘲笑使我受不了。我真实的志愿是想报考拖拉机制造学校，十四门功课我有十三门是五分，唯有写作是四分。我仍然没有改掉老毛病：喜欢看小说，却不喜欢作文。他们把“想当作家”这顶不属于我的帽子扣到我头上，然后对我加以讽刺和挖苦。已经毕业，大家即将四分五散，我已无法报复。而且一个人对一场运动又怎能施以报复呢？一口恶气出不来，吐血了，没有任何症候的吐血，大口吐过之后，就改为经常的痰里带血。害怕影响毕业分配，不敢去医院检查，不敢告诉家里，更不敢让他们知道弹冠相庆。一个人躲到铁道外边的林场深处，偷偷地写稿子，一天一篇，两天一篇，不断地投给报社和杂志，希望能登

出一篇，为自己争口气，也好气一气他们：你们不是说我想当作家吗？我就是要当出个样子来叫你们看！但是所有的投稿都失败了。事实证明自己的确不是当作家的材料，而且还深深地悟出了一个“道理”：不管什么书都不要轻易批判，你说他写的不好，你恐怕连比他更差的书也写不出来。

对文学的第一次冲击惨败之后，我死心塌地地进了天津重型机器厂技工学校，这是国家的重点企业。厂长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在《新名词词典》伟人栏里有他的照片和一整页的说明。工厂的规模宏伟巨大，条件是现代化的，比我参观过的拖拉机制造学校强一百倍。真是歪打正着，我如鱼得水，一头扎进了技术里。想不到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对机器设备和操作技术有着特殊的兴趣和敏感，两年以后就当上了生产组长。师傅断言我手巧心灵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大工匠（就是八级工），但是必须克服爱看闲书、爱看戏的毛病。一个学徒工竟花两元钱买票去看梅兰芳，太不应该。我热爱自己的专业，并很高兴为它干一辈子，从不再想写作的事，心里的伤口也在渐渐愈合，吐血的现象早就止住了，到工厂医院照相只得了四个字的结论：左肺钙化。但也留下一个毛病：生活中不能没有小说，每天回到宿舍不管多晚多累，也要看上一会儿书。

正当我意气风发，在工厂干得十分带劲的时候，应征入伍了。丢掉自己心爱的专长未免可惜，一想到进部队后能走南闯北，开阔眼界，便毅然穿上了水兵服。但当水兵没有下水，是旱鸭子，考上了海军制图训练学校，毕业后搞制图。眼界果然大开，我一下子看到了整个世界。世界的地理概况是什么样，各个国家主要港口的情况我都了解，我甚至

亲手描绘过这些港口。我从农村到城市，由城市进工厂，从工厂到部队，经过三级跳把工农兵全干过来了。

当时部队上正时兴成立文艺宣传队，搞月月有晚会。我是班长，为了自己班的荣誉，每到月底不得不编几个小节目以应付晚会。演过两回，领导可能是从娃子里选将军，居然认为我还能“写两下子”，叫我为大队的宣传队编节目。小话剧、相声、快板、歌词等等，无所不写。有时打下了敌人的U，高空侦察机，为了给部队庆贺，在一两天的时间里就得要凑出一台节目。以后想起来，给宣传队写节目，对我来说等于是文学练兵。写节目必须要了解观众的情绪，节目要通俗易懂，明快上口，还要能感染人，而且十八般兵器哪一样都得会一点。这锻炼了我的语言表达能力，逼我必须去寻求新的打动人心的艺术效果，节目才能成功。

文艺宣传队的成功给了我巨大的启示。元帅、将军们的接见，部队领导的表扬，观众热烈的掌声，演员一次次返场、一次次谢幕，这一切都使我得意，使我陶醉，但并未使我震动，并未改变我对文艺的根本看法。我把编排文艺节目当成临时差使，本行还是干制图。就象进工厂以后爱上了机器行业就再也不想当作家一样，我把制图当成了自己的根本大业，搞宣传队不过是玩玩闹闹。而且调我去搞宣传队，部队领导的意见就不一致，负责政工的政委点名要调，负责业务的队长坚决反对。我所在部队是个业务单位，当时正值全军大练兵、大比武，技术好是相当吃香的。我在业务上当然是顶得起来的，而且已升任代组长（组相当于步兵的排一级单位），负责全组的业务工作。如果长期不务正业，得罪了握有实权的业务领导，就会影响自己的提升。业

务单位的宣传队是一个毁人的单位，获虚名而得实祸，管你的不爱你，爱你的管不着你，入党提干全没有份。但是，有一次给农村演出，当进行到“诗表演”的时候，有的社员忽然哭了出来，紧跟着台上台下一片歔歔之声。这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子，几经苦难，每个人有不同的遭遇，不同的感受，诗中人物的命运勾起他们的辛酸，借着演员的诗情把自己的委屈哭出来了。

社员的哭声使我心里发生了一阵阵颤栗，使我想起了十多年前我卧在小油灯底下磕磕巴巴地读那些闲书，而乡亲们听得还是那样有滋有味。我对文学的看法突然间改变了。文学本是人民创造的，他们要怒、要笑、要唱、要记载，于是产生了诗、歌和文学，现在高度发展的文学不应该忽略了人民，而应该把文学再还给人民。文学是人民的心声，人民是文学的灵魂。作家胸中郁积的愤懑，一旦和人民的悲苦搅在一起，便会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人民的悲欢滋补了文学的血肉，人民的鲜血强壮了文学的筋骨。

文艺不是玩玩闹闹，文学也决不是名利思想的产物。把写作当成追名逐利，以为只有想当作家才去写作，都是可怕的无知和偏见。所以，过去我为了给自己争口气而投稿，以致于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肩上没有责任，对人民没有责任，对文学也不负有责任，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一试不行就拉倒。文学不喜欢浅尝辄止，不喜欢轻浮油滑，不喜欢哗众取宠。写作是和人的灵魂打交道，是件异常严肃而又负有特殊责任的工作。人的灵魂是不能憋死的，同样需要呼吸，文学就是灵魂的气管。

我心里涌出一种圣洁般的感情，当夜无法入睡，写了一

篇散文。第二天寄给《光明日报》，很快就发表了。紧接着又写了短篇小说《新站长》，听信一个甘肃的战友的话，寄给了《甘肃文艺》，很快也发表了。然后就写起来了，小说、散文、故事、通讯什么都干，这些东西陆陆续续在部队报纸和地方报纸上发表了。

我为此付出了代价，放弃了绘图的专长，断送了有可能“升官”的前程，但我并不后悔，我认识了文学，文学似乎也认识了我。带着一百九十元的复员费，利用回厂报到前的休息时间，单身跑到新疆、青海、甘肃游历了一番。我渴望亲眼看看祖国的河山，看看各种面目的同胞。直到在西宁车站把钱粮丢了个精光，才心满意足地狼狈而归，回到原来的工厂重操旧业。

一九六六年，各文学期刊的编辑部纷纷关门，我有五篇打出清样的小说和文章被退回来了。由于我对文艺宣传队怀有特殊的感情，便又去领导工厂的文艺宣传队，以寄托我对文学的怀念，过一过写作的“瘾”。一九七二年，《天津文艺》创刊，我东山再起，发表了小说《三个起重工》。

我的文学道路就是这样一篇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流水账。我相信文学的路有一千条，一人走一个样儿。

我舍不得丢掉文学，也舍不得丢掉自己的专业，至今还举棋不定。但是每经过一次磨难就把我逼得更靠近文学。文学对人的魅力，并不是作家的头衔，而是创造的本身，是执着的求索，是痛苦的研磨。

按着别人的脚印走不出自己的文学创作的路，自己的路要自己去闯，去踩。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

失败——作家最忠实的保姆

人活一世该有多少个“第一次”？第一次学话，第一次学走路，第一次坐进课堂，第一次走进工厂，第一次扣动扳机，第一次听见孩子喊自己为“爸爸”……有了第一次，才有第一百次，第一万次。有了尝试，才有失败和成功，不论失败或成功，“第一次”都是值得珍惜的。

人生中的许多“第一次”，都是十分明确、记忆深刻的。然而作家的第一篇“作品”，往往被当成是作家第一次发表出来的作品，或者是使作家成名的作品，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概念。也许有的作家第一次写作就能成功，就能一举成名。但更多的情况是：从写“第一篇作品”到写出一篇能够公开发表的作品，这中间还有一段艰苦甚至是漫长的历程，是由无数次的失败铺成了一个个台阶，使其一步一步走上了文坛（这里所说的“第一篇作品”单指第一次“投稿”。按理说，每个人的第一篇语文作业、第一次写信、第一篇作文，也都可以列作是“第一篇作品”）。

人活一辈子难免会有许多失误，或者叫失败，一生下来就所向无敌、只要想干什么就必然成功的人是没有的。所谓“人无完人”嘛。社会有假相，生活有假相，知识也有真伪，眼睛可能欺骗自己，感觉也可能欺骗自己，唯有失败的